

「历代顶级文臣系列」丛书主编◎毛佩琦教授

# 秦汉顶级文臣

孙家洲

等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K827/696  
:2  
2007

「历代顶级文臣系列」  
丛书主编◎毛佩琦教授

# 秦汉顶级文臣

孙家洲 等

借

白山文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顶级文臣 / 孙家洲等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

(历代顶级文臣系列)

ISBN 978-7-80673-940-2

I. 秦... II. 孙... III. 大臣—列传—中国—秦汉时代  
IV. K82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856 号

**秦汉顶级文臣**

- |         |   |       |        |
|---------|---|-------|--------|
| 作者:     | 孙家洲等  | 丛书主编: | 毛佩琦    |
| 责任编辑:   | 申强  | 策划:   | 张国岚    |
| 特约监制:   | 李耀辉   | 责任校对: | 成仁     |
| 特约编辑:   | 倪新玉   | 封面设计: | 门乃婷工作室 |
| 出版发行:   | 花山文艺出版社   |       |        |
| 地址:     |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
| 邮政编码:   | 050061  |       |        |
| 网上书店:   | <a href="http://www.hspul.com/ecity">http://www.hspul.com/ecity</a> |       |        |
| 邮购热线:   | 0311—88643242   |       |        |
| 销售热线:   | 0311—88643227/3228/3229   |       |        |
| 传真:     | 0311—88643225   |       |        |
| E-mail: | hspul@163.com   |       |        |
| 印刷:     |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       |        |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
| 开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       |        |
| 字数:     | 207 千字  |       |        |
| 印张:     | 15.5  |       |        |
| 版次: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br>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书号:     | ISBN 978-7-80673-940-2  |       |        |
| 定价:     | 23.80 元   |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序 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些士大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呢？这又要说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要忠心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我们历数古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刘备三顾茅庐，隆中问计，请诸葛亮出山，朱元璋聘请浙东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到自己的军中，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种种故事，向来脍炙人口。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宁可不做官。

那么，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他们心中的“道”是什么？换句话说，作

为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一言蔽之曰：“安民”。

如何安民？扫灭群雄，一统天下是安民；制礼作乐，建立秩序是安民；治水开山，兴农殖货也是安民。为了安民，他们展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智慧；为了安民，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安民，他们呕心沥血，不惜拼死直谏。他们的安民，往往是通过忠君来表现的。忠君是手段，安民才是目的。阿谀逢迎并不是真的忠君，“以道事君”，不惜犯颜直谏，使君归于正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靠什么安民？有一个著名的掌故，说到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历任太祖、太宗两朝，三度为相，他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不论是戡乱平叛、统一天下，还是富国裕民、臻于至治，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都只用半部《论语》就够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手中的法宝，他们认为以此治国平天下将无往而不胜。其所以能够取胜，则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爱民才可以安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民就无往而不胜，半部《论语》足矣！

历代文臣治国，也并非纯用儒学，儒、兵、法、道等等，不免杂用。历代治世能臣，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施展才华。有人有幸遭遇明主，受到信任，柄政握权，一展抱负；有人明珠投暗，受到猜忌，被人嫉恨；有人生居显赫，死蒙哀荣；有人功成身退，百代流芳；也有人作威作福，遭人唾骂。治世能臣也各有七情六欲，甚至并非正人君子。而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不同风采，又各留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可供我们品味和咀嚼。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供我们继承和借鉴。至于那些品德高尚，心系百姓忧乐的仁人们，借用宋代范仲淹的话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堪称读书人的千古风范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毛佩琦

2006年10月31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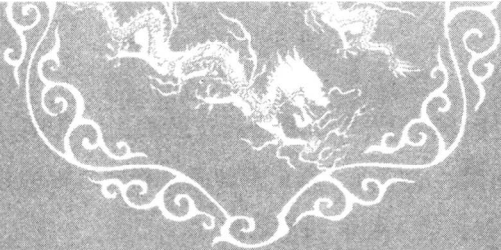
# 秦汉顶级文臣

## — 目 录 —

- 1 / 为利禄所累的政治家——李斯
- 27 / “萧规曹随”安天下——萧何与曹参
- 41 / “六出奇计”的智者——陈平
- 59 / 雄辩奇才，潇洒名士——陆贾
- 75 / 宦海沉浮，刚烈豪客——窦婴
- 93 / 毁誉参半的布衣宰相——公孙弘
- 109 / 中兴名臣——霍光
- 125 / 通明儒相——翟方进
- 139 / 河西雄杰，见机辅臣——窦融
- 155 / 谋国有胆识，保身乏心术——朱浮
- 171 / 政声震天下——第五伦
- 187 / 官场万事通——胡广
- 203 / 空怀正气，无奈衰世——杨震
- 219 / 跋扈权臣，当道豺狼——梁冀

# 为利禄所累的政治家

## 李斯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身居丞相高位的人为数甚多，但是被后人认定应该对一个朝代的成败兴亡均负重责的丞相则屈指可数。秦相李斯（？—前208），无疑是此类人物的翘楚魁首。李斯的一生，都在为追逐利禄富贵而奔波不止，他具备超人的见识与才华，懂得权术与阴谋，经历过成功与得意，创造过辉煌与罪恶。直至死到临头，他才醒悟到，终其一生所夺来的荣华富贵，全是一过眼烟云，政客在政争中一旦失手，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奢望了！

在悠久的历史中国历史上，身居丞相高位的人为数甚多，但是被后人认定应该对一个朝代的成败兴亡均负重责的丞相则屈指可数。秦相李斯（？—前 208），无疑是此类人物的翘楚魁首。

李斯的一生，不仅与秦王朝相伴始终，而且对它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对李斯的特殊地位是给予高度关注的。《李斯列传》对秦朝兴衰内因的揭示，甚至比《秦始皇本纪》更为深刻。司马迁对李斯的人格，有人木三分的刻画，追逐名利、贪恋禄位，足以作为李斯的一生定评。对于李斯的身家悲剧和历史功过，司马迁也有一番别具深意的“一家之言”，尤其是说李斯咎由自取，虽遭灭族之祸而不得称之为忠臣，实属精当之论。

追名逐利之心，世人或许大多有之，但把它置于人生追求的何种地位，却因人而异，随之而有人格的高下之分。为追求利禄而奋斗，本来是古代士人最正常的选择；而身居高位之后，为了保住既得权势和利益，就不顾道义、不择手段，则被视为士人道德伦常的叛逆。李斯虽然才高一世，但他的一生却都在为官位利禄而奔波，他遭受极刑之祸，却难以博得后世正直士人的理解和同情，原因就在于此。

才高而德低，对于士人而言，就难免“小人”之嫌。另外一位伟大的







历史学家司马光,对“君子”与“小人”从“德才”的比例关系上做出一个界定:“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并且,司马光还指出,“小人”而有“智、勇”之才,是最为可怕的,“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这段话,用于理解李斯的一生及其历史影响,大概有点针对性。

### 感慨“鼠论”,端倪人生

李斯,本为战国后期的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一布衣。年轻时曾为郡中小吏,见到吏舍厕所内的老鼠,只能吃秽物,而且一旦有人、犬出现,就惊恐奔逃。而粮仓中的老鼠,却安食积粟,居住在大屋之内,不受人、犬的侵扰,李斯由此大发感慨:“人被评定为贤能和不肖,其实正如老鼠一样,关键在于把自己置于何种地位上!”

这种感慨,绝对是李斯的专利。一般人对老鼠,无论是仓中鼠,还是厕中鼠,都持厌恶之心,不屑于去比较两者之间环境的不同、心态的分殊,而李斯却留心观察,并由此得出了这种“权势地位至重”的人生价值观。在他看来,地位权势,不仅决定着生活的奢华与贫贱,也决定着贤能与不肖的德才评价。一句话,权势地位决定着人生的一切。此后,李斯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把自己置于“仓中鼠”的地位,而力图避开“厕中鼠”的境地。

身为平民的李斯,既无勇武可逞,为了爬向社会的高层,只有走求学干禄的道路。于是,他拜战国后期最负盛名的学者荀况为师,学习治国之术。学业既成,总需要选择一个卖艺求官的国家。精于算计的李斯,认为自己的祖国已经走向衰败,其他国家也已乱弱,无法为他提供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的舞台,于是,他选定西入秦国,以谋求发展。在向老师辞行时,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现在秦王有志于吞并天下,这正是布衣之士博取功名利禄的大好时机。身居卑贱的地位,而不想抓住时机,

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这如同眼馋鹿肉却羞于出手抢夺一样，只是空有人的体貌，却没有为人的志向和立世的才干。污辱莫大于卑贱，悲哀莫过于穷困。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困苦的境地，不思改变，却高标自己品德高尚，批评世风败坏，厌恶追逐名利——这样的举动，不符合有才干的士人的本性。所以，我准备去秦国面见秦王了。”

这番话，以不加任何掩饰的语言，道尽了利禄之徒的心态，甚至是道出了别人不愿说、不屑于说的话。凡是心智正常的人，自然都不会甘居于卑贱与穷困境地；但是，把卑贱与穷困，视为人生最大的耻辱和悲哀，而且坦然宣布为了改变这种地位，可以不择手段，就是势利心态作祟的人格扭曲了。李斯的悲剧，即根源于此。

李斯上述“高论”的可怕之处，还在于把自己的“功利观”说成为士人最理性的选择，而把不同于他的选择的人，贬斥为虚伪或是无能。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要在同类中确立一种“话语霸权”：凡是不同意我的观点、不认可我的选择的士人，不必在我面前喋喋不休，你们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在我这里一钱不值，你们不具备与我平等对话的资格。这种盛气凌人的自信，是“霸气”的宣泄，还是逃避质疑的预设遁词？我们无从确切得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尽管李斯身为士人，但在他的心目之中，从来没有把士人引为同类，他要将自己置于士人之上，或是士人的对立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李斯后来的建言“焚书”，从心态来分析，应该与之直接相关。

## 大展雄才，助成帝业

李斯西行入秦，正是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即位，相国吕不韦实掌政柄的时代。工于心计的李斯立即投奔到吕不韦门下，做了一个随侍左右的舍人。李斯极力表现自己的才干，吕不韦对之大加赏识，把他推荐给秦王政担任郎官。郎官的级别虽然不高，却是秦王身边的近侍，这





自然是继续向上爬的有利台阶。李斯不断地进计献策，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建议吞并六国、完成统一的大段宏论：“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他接着说：“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能，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足以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这是当今之世难得一遇的良机。如果现在怠慢而不迅速促成，等到各国势力再度强大起来，联合抵御，即便是有黄帝那般贤能的君主，也无法完成统一的大业。”李斯的这番话，对尽快完成统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做了全面的分析。李斯的进取精神与分析问题的冷静和深刻，是其他大臣无法比拟的。因此，李斯很快赢得秦王政的垂青，被晋升为长史，后又擢任为客卿，得以参议国事。

正当李斯仕途得意之时，突然发生的“逐客”事件，差一点断送了李斯的政治前途。秦王政十年（前237），发生了两起大事：嫪毐谋叛被平定；相国吕不韦受嫪毐案的牵连而被罢免。秦国的一批本土臣僚，对国君任用来自他国的士人为“客卿”的做法，早就心怀不满，借此扩大事态，宣称所有来自山东六国的人，都是为其故国谋利益的，有间谍的嫌疑，因此主张将所有滞留在秦国的人，一概驱逐出境。秦王政在“亲政”之初，为了抗衡吕不韦的潜在势力，不得不笼络本土宗亲，所以未经深思熟虑，就下达了“逐客”的命令。为了雷厉风行地推行“逐客令”，还配合进行了“大索”行动，即大规模搜捕。一批本来在秦国寻求发展出路的士人，均在被驱逐之列。其中也包括李斯在内，他只好打点行装，走上东归之路。

秦国素有尚武之风，本土不乏精兵良将，但是文教落后，很少出现政治家、谋略家，更无文人学士。在这种背景之下，秦国长期推行的“客卿”制度，成功地吸引了其他国家怀才不遇的人才入秦为官，出谋划策，有效地弥补了秦国缺乏人才的缺陷。而现在秦王的一道“逐客令”，等于废止了行之有效的客卿制度，在“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特定环境下，势必对秦国的发展不利。被驱逐的李斯洞悉其中的利害所在，他更不愿意把在

秦国所奠定的根基尽失于一旦，于是，他在被迫离秦的途中，上书秦王政，这就是千古名篇《谏逐客书》。李斯倾其雄才于一书，写得酣畅淋漓，词婉意切，极富说服力。

李斯首先历数客卿对秦国富强所做出的贡献：秦孝公重用商鞅推行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秦惠王重用张仪，“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秦昭王重用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据此看来，秦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都是借助于客卿的贡献。他底气十足地质问“客何负于秦哉”！假如以往的秦国国君拒绝客卿，就会“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随即直言逐客令的失误：秦国的宫室之中，充溢着来自山东六国的宝玉、明珠、宝剑、骏马、乐器、美女，为何不能容纳来自山东六国的人才？“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绝非“跨海内，制诸侯”的正确方略。他指出，高明的统治者，一定要有宽阔的胸怀，“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逐客令却是胸襟狭隘的产物，它的直接危害是，遭受秦国排斥的杰出人才，会转而投向敌国，帮助其他诸侯发展势力；另外的消极影响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这都会对秦国的根本利益形成伤害。李斯的结论是：

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谏逐客书》，完全是从利益分析入手，可谓丝丝入扣、入木三分。秦王政对政治利害问题，有着近乎天才的敏感和判断力。他在阅读李





斯的上书之后，立即采纳其建议，下令停止逐客。据说，秦王政还派出专使，追赶李斯，在骊邑将他追回。包括李斯在内的一批六国人才，得以官复原职，继续在秦国效力。秦国的客卿制度，也因此而得以继续沿用。这对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影响深远。就在这一年，另外一位对秦吞并六国贡献出战略大计的关键人物——尉繚，便从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来到秦国。如果“逐客令”不被废止，尉繚就不可能在秦国立足，更不必说发挥作用了！

相隔两年，李斯又经历了另一场宦海风波。已被罢免相国官职的吕不韦，还享有一定的声望，各国使者多有去拜访者，终究无法见容于雄主秦王政，而被下令赐死。吕不韦本来就广招门客，其中多数人是来自东方各国的失意士人。吕不韦陷罪而死，这批人士中一部分讲究义气的人，不顾国家禁令，将吕不韦的遗体盗出，安葬在洛阳北芒山，并且集体哭祭，哀声动人。这是以私交之谊而公开抗拒君主严威。最令秦王政不可容忍的是，此次活动竟然有宾客数千人参加，这无疑是对秦王政的大规模“抗议”，甚至是挑战。专制君主是不会对倔强的士人妥协的。秦王政按照“窃葬”的罪名，加以严厉惩治：凡是吕不韦的舍人参加哭祭的，外国人加以驱逐，秦人有六百石以上官职的则剥夺其官爵，加以流放。由此不难看出，秦王政对吕不韦一系势力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李斯本来也是出于吕不韦门下，并受吕不韦的推荐而任官，按照常情，理应受到这场风波的冲击，但奇怪的是，李斯不仅未受牵连，反而更受秦王政的赏识和倚重。其中详情，史籍失载，但其奥妙，不难推知：以李斯之精明，他决不会为了感念旧情，而对已经倒台身亡的吕不韦表示半点同情，倒是极有可能及早地与吕氏势力划清了界线，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秦王一边，甚至有反戈一击之事，也未可知！

李斯躲过了两场宦海风波，终于在政治权力的核心圈站稳了脚跟。他在追求个人利禄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为秦完成统一大业贡献过战略智谋。李斯向秦王政献计，暗中派遣能言善辩的谋士携带金玉重宝去游

说各国,各国的大臣名士可以使用财宝贿赂的,就以丰厚的馈赠来笼络收买;不肯接受贿赂的,就派出刺客以利剑刺之。对山东六国君臣施加离间之计,使得六国人才无法施展其抱负与才能,然后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是一套充满了政治诡计的决战方略,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个显例:赵国杰出将领李牧,在秦强赵弱已成定局、势力对比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之下,曾于公元前 233 年、前 232 年两次击败来犯的秦军,成为赵国乃至山东六国抗秦自卫的旗帜性人物。秦人无法战场上击败李牧,就使用了重金收买和离间之计,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使之诬陷李牧有造反之心。赵王轻信谗言,于公元前 229 年收杀李牧,做出了自毁长城的愚蠢之举。秦人则为此而弹冠相庆。齐国丞相后胜,同样接受了秦人金玉重宝的贿赂,在强秦不断蚕食鲸吞的局势之下,拒绝出兵救援其他国家,并且以惧怕招致秦军进攻为名,不整军经武,甚至不做任何的边境防御准备。结果是,曾经与秦国并称双雄的齐国,竟然坐视其他国家依次被秦人吞并,最后齐国未经交战就向秦国投降了。秦人对六国施加离间之计,当然不是开始于李斯的建策,但是,把收买、离间的策略有意识地运用于为统一大业服务,则与李斯的上述建议有直接的关系。

从这一意义上说来,称李斯是辅助秦王政完成统一的高级谋略家,当不为过。

然而,在秦国统一前夕,李斯为了保住首席谋臣的一己之私,也做了一件令后人诟病的事情。与李斯同出荀子门下的韩非,本来是韩国的贵族人物,好刑名法术之学,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孤愤》、《五蠹》流传入秦,秦王政阅读之后,竟然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公元前 233 年,韩非西行入秦,秦王政虽然欣赏其学问,对他的身世背景有所疑虑,未加信用。李斯和另一位宠臣姚贾共同在秦王政面前谗害韩非:

秦  
漢  
頂  
級  
文  
臣





韩非是韩国的宗室贵族，现在大王想要兼并诸侯各国，韩非从根本上说来是为韩国的利益服务的，不可能真心为秦国效力，这本来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重用韩非，假如久留秦国然后让他归国，这是自遗祸患。不如寻找一个罪名将他诛灭。

秦王政听后深以为然，将韩非逮捕下狱。李斯为了防止别生枝节，派人给韩非送来毒药，迫使韩非自杀。韩非不愿意稀里糊涂地结束生命，希望能够面见秦王政，他自信一旦有面谈的机会就可以改变命运。李斯对这位同窗的能量不敢低估，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稍后，秦王政果然后悔了，使人到狱中赦免韩非，但是，韩非已在李斯的“关照”之下，服毒身亡了。人死不得复生，秦王政也无可奈何。李斯为何容不得韩非在秦国立足？后人相信，是出于忌妒和防范之心。忌妒韩非的政治学问超过自己，防范韩非取代其地位。这样的推测，确实有其依据。细看李斯陷害韩非的“理论依据”，竟然与当年秦国宗室大臣的“逐客”主张若合符契，他的《谏逐客书》几乎可以成为韩非的辩护词了！失意的李斯与得势的李斯，在政治见解上可以如此自相矛盾！大概这就是政客的“此一时，彼一时”吧？

## 参与决策，功过千秋任人评说

在统一天下之后，李斯作为秦始皇最受信任的大臣，参与了许多国家大计的决策过程。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有三件事情。

其一，参与了“议帝号”的朝议。在统一完成的当年，秦始皇不满意群臣所上“泰皇”的尊号，独出心裁定号为“皇帝”，而且自称“始皇帝”，其下以世计，希冀世代相传，至于无穷。在这一议事过程中，李斯以廷尉的身份参与，当然领略了秦始皇的独断之威。



其二，在“议郡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着规模空前的帝国版图，应该以何种国家体制加以统治成为秦朝统治者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丞相王绾等人建议：“诸侯各国刚刚被吞并，特别是燕、齐、楚三地与关中相距遥远，如果不在这些地区设置封王，就很难加以镇抚。特此奏请封立几位皇子为王出镇边远地区，恳求皇上批准。”这一奏请的大前提是，在帝国的腹心地带实施郡县制管理，而在最新征服的边远地区，如果直接以郡县制管理有鞭长莫及之感，因此建议以分封制加以控制。秦始皇把王绾等人的建议交付群臣讨论，朝廷群臣都以为可行，唯独廷尉李斯持不同意见，提出了驳议，他说：

周朝的文王、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立国的很多，随着传世久远，这些诸侯封君与周天子的亲属关系日益疏远，各国之间相互攻击如同仇讎一般，诸侯们轮番出兵攻伐，周天子根本没有能力禁止。现在海内赖陛下神灵威严归于一统，天下皆为郡县，各位皇子和功臣的优遇，使用国家的赋税收入重重赏赐他们，很容易控制他们。天下人都无其他念头，这是保持国家安宁的好方法。分封诸侯的建议不可实行。

秦始皇做出裁决：“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人共同的劫难就是战争持续不断，这完全是因为有受封立国的侯王存在。现在仰赖祖先英灵护佑，天下刚刚完成统一，如果又推行封国制度，就是在制造未来的兵连祸结，还想求得天下宁息，岂不难哉！廷尉的议案是正确的。”李斯的建议，对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显然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三，建“焚书”之议，推波助澜酿成文化劫难。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这是秦朝政治走向极端专制残暴的标志性一年，造成千古文化劫难的“焚书坑儒”事变，就发生在这个年份中。而李斯就是直接促成“焚书”之祸的始作俑者。事情的起因是，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





臣等当面颂扬秦始皇的威德，颂词称：“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当然是龙颜大悦。可是，偏偏有位担任博士官的齐人淳于越出面反驳，他说：“殷、周两代的统治持续了千余年，是因为推行分封子弟、功臣立国的制度，以为屏蔽辅佐，而现在‘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万一出现类似田常取代姜齐、六卿控制晋国之类的权臣发动事变，朝廷没有封国作为支撑，用什么来挽救危局？”淳于越由此推出一个论断：“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认为国家行事不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而能够长治久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在批评秦朝不推行分封制度，是违背历史传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淳于越还批评博士仆射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下令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政见。

美化古代政治借以谏诤世主，本来是读书人论政的常见方式。而此时的秦始皇已变得刚愎自用，如何容得下博士淳于越的直言切谏？时任丞相的李斯，对秦始皇的真实意图洞若观火，出面驳斥淳于越的观点：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李斯进一步指出，淳于越所说的乃是夏商周三代之事，何足效法？如果李斯的话到此为止，还主要是以类似于“历史进化观”的思想来解释国家制度应该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不应该为古代制度所束缚，这种思想本身体现的是历史的进步；其中尽管贬斥淳于越是“愚儒”不懂国家大计、从而剥夺了淳于越论政资格，难免有偏激、霸道之嫌，倒也无伤大雅。最糟糕的是，李斯针对淳于越批评朝政的个案，借题发挥、扩大事态，把读书人说成为专门喜欢与当政者作对的社会群体，应该予以镇压。他说，现在天下已经统一，法令出于一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